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6-0666-05

章太炎、孙中山的“封建”论

冯 天 瑜

[摘 要] 和黄遵宪、梁启超、严复一样,章太炎、孙中山代表了清末民初先进中国人的封建观。章氏“封建”论的基本点是:前近代中国“去封建远”,日本“去封建近”,两国近代化的基点有别。孙氏“封建”论的基本点是:“中国两千多年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继起的是“君主专制”,以“民主共和”取代之是民权革命的任务。他们的“封建”论,不仅是融通古义与西义的新名“封建”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真切认知民主革命的“窗口”。

[关键词] 封建;专制;民主革命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识码] A

在汉字文化圈,借“封建”一词比拟欧美政制,使“封建”具有普世意义的,首创者有两类:一为来华西方人,如长期定居香港的英国汉学家李雅各(1814—1897),他将《周易》译成英文时,以 feudal ruler 对译“封建诸侯”;二为最初“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如林则徐(1785—1850),他主持编译《四洲志》(1841年首次刊印),其“三十一育奈士迭国”(指美利坚合众国)称美国“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①。此后,以“封建”对比欧美政制,还见于魏源(1794—1857)的《海国图志》(1843)、徐继畲(1795—1873)的《瀛环志略》(1848)等。这些书皆为编译西洋人史地著作的产物,显示了19世纪40年代中西人士以“封建”对译 feudalism 的最初尝试。而《海国图志》、《瀛环志略》19世纪50年代便传至日本,并受到幕府及士人的重视。由于上述译法的影响,时至19世纪70年代,日本人正式以“封建”对译西方史学术语 feudal,至19世纪八九十年代,“封建”已在日本成为一个流行的新名,它是这一汉字词古典义(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与 feudalism 含义(封土、采邑)相通约的产物。而恰在此时,中国人开始注目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借用包括“封建”在内的日译新名也自此开启端绪。经过一段消化吸收,清末民初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如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渐次形成了自己的封建观,并以此表述、诠释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特定阶段,从而在中国构成了接纳融通古义与西义的新名“封建”的谱系。本文推介的章太炎、孙中山的封建论,不仅有助于补足这一新名“封建”谱系,而且有助于达成对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的革命话语及革命本身的重新认识。

一、章太炎的“封建”论

作为史学家的章太炎,自青年时代即有“引古鉴今”的追求,1902年立下修《中国通史》之志,后来更制订修百卷本通史的计划,以“启导方来”。章氏治史用力批评循环论和庸俗进化论,不赞成康有为以今文经学治史的主观方法,执著于古文经学方法,将经书当历史看,其封建观具有历史眼光。

(一)从抑制君主集权角度肯定“封建”

与严复兼及西义有别,章太炎是从中国传统史学视角讨论“封建”的,大体承袭顾炎武之说,从“分治”

意义上探究“封建”的价值。1899年10月，章氏撰《藩镇论》，开篇即指出：“自封建之法不行于后世，于是策时事者每以藩镇跋扈为忧，是其言则孤秦陋宋之冢嗣也。”^[1]（第99页）他把封建制必然导致藩镇割据的言论斥之为“孤秦陋宋”，原因在于，章氏痛恶专制君主集权，向往宪政式分权，故寄望“藩镇”（借指清末执掌地方大权的督抚，如张之洞、刘坤一辈）在君主专制向宪政转变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章氏说：

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今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若皇德贞观，廓夷旧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如日本之萨、长二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患自擅。^[1]（第102页）

章氏所抨击的“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指清廷借“立宪”之名，企图将封疆大吏的权力收归满洲亲贵。章氏从日本幕末维新过程中一些藩国对社会改革发挥积极作用的事实中得到启示，期待中国的封疆大吏仿效日本萨摩、长州等西南强藩支持维新，维新后又将藩地交还朝廷，如能这样，藩镇就是一种积极力量，成为推进社会进步的因素。

同年，章太炎又作《分镇》，在征引唐人马周、李百药、柳宗元批评封建制、倡导郡县制的名论之后，指出这些言论产生在国家清明之时，“未有外侮，其论议固足以自守也”。而宋代外患严重，“李纲始有分镇之议”，由此，章氏认为“封建”并非一概皆坏，“郡县”并非一切都好，纵观历史，

然后知封建之说未必非，而郡县之说未必是也。^[1]（第104页）。

1900年，章氏鉴于戊戌政变、庚子国变的事实，又对封疆大吏和新派人物都颇为失望，称“今督抚色厉中干，诸少年意气盛壮，而新用事者，其蕙畏又过大耄旧臣……纵满洲政府能弃，若无收者何？”遂作《分镇匡谬》，对先前的寄望于封建（分镇）的论说作出修正^[1]（第107页）。

章太炎是从“封建”古义（封爵建藩）上讨论中外封建制的，他并不认同将“封建”对应西洋术语。严复的译作《社会通论》，以“封建”对译feudal，为中国人引入一种新的历史分期框架[蛮夷社会—宗法社会（其前段为封建时代）—军国社会]。梁启超及陈独秀都受到严译的影响，而章太炎则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力驳严译，他于1907年发表《社会通论商兑》，批评严复译《社会通论》时构筑的历史分期，章氏指出，“泰西群籍”所列“条例”，不能照套“亚东之事”，若论及亚东史迹，“则其条例又将有所更易矣”。他说：

心能流行，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2]（《民报》第12号）

这里的“一方”即指西方，章太炎不赞成以西方史学框架概括中国历史实际，因而不认可严复将“封建”对应feudal的译述。

（二）以“封建”比附代议政体

随着西学知识的增长，章太炎后来的观点有所发展，也开始用“封建”类比某种西洋制度。他于1908年10月作《代议然否论》，将“封建”比附西欧代议制的贵族院，文曰：

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其上置贵族院，非承封建者弗为也。^[1]（第456页）

章氏不仅将英国式的代议制称“封建之变相”，认为贵族院（上议院）承袭封建制，而且认为“迄汉世去封建犹近，故昭帝罢盐铁榷酤，则郡国贤良文学主之，皆略似国会”^[1]（第456页）。可见，章氏把“封建”与“专制”相对立，认为“封建”包含“分权”、“众议”诸义，故章氏将“封建”与“议院”、“国会”相类比，作“专制”的反义词使用。章氏论“封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未止于议史，而是借以评今，试图发现古今政制间的联系性。章氏的这种类比，当然存在牵强之处，严复曾给予批评。

章氏通过中外比较，敏锐地洞察到，前近代中、日两国政制的重大差异：中国“去封建远”，日本“去封建近”，因此，两国政制近代化的基点不同：

议者欲逆反古初，合以泰西立宪之制，庸下者且沾沾规日本，不悟彼之去封建近，而我之去封建远。去封建远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贵族黎庶之分。^[1]（第456页）

章氏认为，民皆平等、无贵族黎庶之分的中国，不宜设上院（贵族院），也就不宜实行代议制。章氏还认定，作为“封建之变相”的代议制，“必不如专制为善”，遂从否定代议制走向否定“封建”，从而与早年因倡导分治而肯定“封建”发生了大改变。可见，章氏的封建观是随其现实的政治主张的转换而变更的。然

而,章氏的封建观虽有大变革,但所用“封建”一词的内涵,始终保持着与本义的联系。同时,他在论述中已把封建制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考察,并进行中西、中日之间的政制比较,其用语固然古色古香,所透露的政治理念也可能在激进与保守间摆动,但他围绕“封建”提出的论题(如反专制的政治改革问题,代议制是否符合中国国情问题,中日封建制的时间错位问题),却颇富前瞻性,视野可谓宽阔而深邃。

二、孙中山的“封建论”

作为兼通中西之学的政治家,孙中山准确把握了史学术语“封建”的内涵(封土建藩)和外延(中国殷周时期、欧洲中世纪),他力倡的政治革命(“民权主义”),其“一扫而尽”的目标是君主专制政体。孙中山1905年发表的《〈民报〉发刊词》曰:

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

孙中山的封建论与“反专制”的自治论相表里。

1900年,孙中山《致港督卜力书》拟“平治章程六则”,其中第二则为“于都内立一中央政府,以总其成;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3](第193页)。这种军事、外交由中央政府宰理,政治、征收、正供由各省全权自理的方案,既参考了美国的联邦制,也是对中国古来郡县制与封建制的综合。当然,孙中山的主要倾向是以适度的“分权”来调节过度的专制集权,在这一旨趣上,孙中山对“封建”取一定程度的欣赏态度。

(一)将民权革命的任务定位在以“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

1905年10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阐发三民主义时说: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

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中指出:“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3](第296页)其革命锋芒直指专制帝制,同文倡导“建立民国”,孙氏高唤:

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3](第297页)

此语以后渐成中国人的共识。辛亥革命推翻专制帝制以后,袁世凯于1916年冒天下之大不韪,复辟帝制,果然遭到“天下共击”,作了60天“洪宪皇帝”便在一片“反袁”声中黯然下台,并在忧恐中丧命。孙氏10年前的话,真可谓一语成谶。

1906年12月,孙中山发表《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发挥民权主义精义说:

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3](第325页)

孙中山同文警告革命者,不得存帝王思想:

惟尚有一层最要紧的话,因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3](第326页)

这是对皇权主义弊害一语破的的揭示。孙氏反复强调:“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3](第326页)

辛亥武昌首义后,孙中山一再发表声明,拒绝袁世凯提出的君主立宪说,力主“组织联邦共和政体尤为一定不易之理”^[3](第560页)。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其《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对民国的企望是:

是用黽勉从国民之后,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4](第82页)

足见,扫除专制,建立共和,是孙中山矢志不渝的追求。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抓住了中国前近代社会的基本问题,指明了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根本任务,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

(二) 慎拒“反封建”提法

孙氏一生提出过许多革命口号,如早年的“振兴中华”,“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中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乃至晚年的“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却从未提过“反封建”的口号。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封建”被列为现实的批判对象之际,孙中山也没有苟同“反封建”的提法。直至晚年,孙中山继续在“封土封臣”、“贵族世袭制”意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并在此一含义上比较、品评中西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晚年仰慕列宁及俄国革命,称列宁为“人师国友”,又有“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之说^[5](第1052页),然而,孙氏并不一概信从来自苏俄的提法。1922年以降,苏俄和共产国际关于现实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论说传入中国,但孙中山只采纳前者,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取“半殖民地”说,孙中山本人此前后的用语是“次殖民地”,而对中国“半封建”说则加以抵制。孙中山认为封建制在中国已结束两千多年,他终生未提含义模糊的“反封建”一类口号。

孙中山对“封建”概念的准确把握,尤其是他直至辞世前夕,仍在古义与西义的融通上论述“封建”,抵制当时开始流行的泛化封建说,这直接关系到中国民主革命目标的认定(“反专制”而并非含混的“反封建”),此一旨趣值得深长思之。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都纳入“反专制”总题之下:“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4](第19页)

(三) 笃信“中国两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

孙中山对“封建”的认识有两大特色:一是会通中西;二是首尾一致。直至晚年,孙氏认为,秦代已结束中国的封建制度,这比欧洲直到中世纪末、近代初的“打破封建”,早了两千年。孙氏1924年1月至8月在广州作《三民主义十六讲》系列演说,其中《民权主义六讲》的第三讲说:

欧洲两百多年以前还是在封建时代,和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时代相同。因为中国政治的进化早过欧洲,所以中国两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欧洲就是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

欧洲没有革命以前的情形,和中国比较起来,欧洲的专制要比中国厉害得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世袭制度。当时欧洲的帝王公侯那些贵族,代代都世袭贵族,不去做别种事业;人民也代代都是世袭一种事业,不能够去做别种事业……中国自古代封建制度破坏以后,这种限制也完全打破。^[9](第164页)

孙中山在这里较准确地把握了“封建时代”、“封建制度”的含义,将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封建制度”(指殷周封建制)与“罗马亡了之后,欧洲列国并峙”相类比,认为“罗马变成列国,成了封建制度”^[9](第150页)。讲演中,孙氏流露出因中国比欧洲较早结束封建历史而产生的自豪感,却没有回答先期终结封建的中国,近代何以会落后于欧洲。而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文第二章“附论中国封建之制与欧洲日本比较”,则对此有所解答:“欧洲、日本,皆封建灭而民权之代兴。”“中国不然,数千年来曾无有士民参与政治之事……兴封建者君主也,废封建者亦君主也,以封建自卫者君主也,与封建为仇者亦君主也。”梁氏指出,这便是“何以中国封建之运之衰,远在欧之先,而专制之运之长,反远在欧洲之后也”的症结所在^[7](第777页)。就此而论,梁启超的“封建观”有更深一层的上下古今之见。

总之,和黄遵宪、梁启超、严复一样,章太炎、孙中山代表了清末民初先进中国人的封建观。他们论“封建”,当然有深浅之别,却有着基本的相似之处:既不坐井观天、固守本义,又不尽弃本义、妄意滥用,而是遵循概念演化的合理路线——坚持古今义的既因且革,中西义的兼容并包。如此重构再造之新名“封建”,其外延指殷周政制,也涵盖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同类政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形态的共名。这种封建观较好地实现了概念演化时继承性与变异性之统一,又初步达成中国传统中学概

念与西方史学概念的通约与整合,其蕴藏的合理内核,值得我辈认真体味。

而尤其值得我辈认真体味的,是孙中山的“封建”语用实践与革命话语。孙氏终其一生反对专制,却没有提过“反封建”之类概念不清的口号。孙中山把社会批判的锋芒指向专制主义的制度性结构,而没有限于对专制君主的个人谴责。他多次指出,中国的积弊是专制、贫穷、迷信、一盘散沙等,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对外抗御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对内革除专制制度,推进民主法治。1903年12月13日,孙氏在檀香山的一次演说的题目即鲜明揭示了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基本目标,那就是“废除专制,实行共和”。而后人以“反封建”评议民主革命,不仅使“封建”逸出于概念的古今演绎、中西涵化的正轨之外,而且造成了在一定程度上淡化、遮蔽人们对“反专制”的真切认知的话语屏障。

注 释:

① 参见林则徐:《四瀛志》,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魏源《海国图志》卷60转载此一评述。

[参 考 文 献]

- [1]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 [2] 《社会通论商兑》,载《民报》1907年3月第12号。
- [3] 《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 [4] 《孙中山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 [5] 《孙中山文集》下册,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
- [6] 《孙中山文集》上册,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
- [7] 《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责任编辑 桂 莉)